

※揚州研究專輯※

焦循的學問

坂出祥伸* 著 廖肇亨** 譯

前 言

焦循，字里堂（又字理堂），晚年號里堂老人。出生於乾隆二十八年，卒於嘉慶二十五年，年五十八。揚州府甘泉縣人，其聲名雖主要建立在晚年的考據學著作《孟子正義》之上。但在此之前，他治學主要從數學、天文學出發，進而從事於《易》學的研究。至於晚年則專心從事於《孟子》的研究，為他作傳的是當時的大官兼大儒阮元（焦循是阮元的姐夫）^①，在傳文中，阮元稱焦循為「通儒」，其實這句話意味深遠，他的學問包羅萬象，從他著作範圍的廣泛便可略窺一端。他不僅長於經學、史學，也長於天文曆算，兼及醫學。此外，與一般考證學者不同的是：他還長於詩詞，又因喜好戲曲的關係，甚至著有關於花部（土戲）的論述《花部農談》^②。他的「通」還不止於此，更貫通於他的治學方法與態度。他主張不拘成見（通核）^③，廣收眾議。他一直抱持著不偏執自己的主張，而應該廣泛聽取各方意見這樣通達的見識，但他的「通」決不是天縱英才，而是拜刻苦勉勵所賜，他在〈里堂道聽錄序〉的讀書筆記序文中說：「余生質極鈍，然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余交遊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二、三十

* 日本關西大學教授。

** 東京大學文學部博士候選人。

① 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收錄於《雕菰集》，但最早似繫於《孟子正義》）。

② 詳參青木正兒：《清代文學評論史》（東京：春秋社，1969年），第10章。

③ 焦循撰：〈辨學〉，《雕菰集》，卷8。

年，盈二尺許矣。」^④他那通博的學問正是這般努力之後的心血結晶。

—

談到焦循的學問生活，大概可以分作三個時期，以下根據他的兒子廷琥所作的〈先府君事略〉分述各個階段的特徵如下^⑤：

第一期是他從十九歲有志於經學以來，中間連續寫作幾篇關於天文算學的論文（今收錄於《里堂學算記》）到四十歲轉向《易》學研究為止的這段期間。他早年當然也曾在科舉下過功夫，但當他二十三歲時，父母（嫡母謝氏，他的生母姓殷）相繼去世，當時由於遭遇連年饑荒，有時甚至無米可炊，不得已只好連吃兩天番薯。但那個時候書店裏有欠了八本，索價三十兩的《通志堂經解》出售，其家中所有的現金尚不足其額之半，當他的妻子聽了他的話以後，立刻拿出金簪，換取十二兩的銀子，湊成二十七兩，旋即復與書店交涉，終得書店主人首肯，得以全數購入，於是當天晚餐只剩下麥糠熬成的稀飯可以糊口，然而夫婦卻樂在其中^⑥。這個插曲說明他的家境並不富裕，無法自由地買書，事實上，他一直到晚年，不是從藏書家處借書，就是在富豪家中借食趁機讀書，從他進京趕考時經費由友人援助一事可以看出他的治學生涯伴有經濟的困難。緣此，他很早就開始廣收門徒以糊口。二十五歲時，友人顧超宗贈他一套《梅氏叢書》，從那時候開始，他就立志鑽研天文曆算之學，當時的天文曆算之學，已經遠較梅文鼎的時代有了長足的進步。《曆象考證》（雍正元年刊）頒布八年以後，由於在日蝕預報發生錯誤，被迫重新修正。乾隆七年完成的《曆象考證後編》十卷係採用歐洲新天文學理論與數值^⑦，關於太陽的運動，放棄了蒲托列馬歐斯以來的「平圓說」，改採克卜勒的「橢圓說」，清濛氣差（大氣差）的數值採用卡西尼的數字。另外哥白尼的「地動說」，很晚才傳進中國，在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 Benoist 所著的《坤輿圖說》（乾隆三十二年）才

④ 焦循撰：〈里堂道聽錄序〉，《雕菰集》，卷 16。

⑤ 收錄於《焦氏叢書》。

⑥ 焦循撰：〈修葺通志堂經解後序〉，《雕菰集》，卷 16。

⑦ 詳參橋本敬造：〈橢圓法的展開〉，收錄於《東方學報》（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 42 冊（1971 年）。

首次介紹^⑧。

焦循從三十二歲到三十五歲之間，陸續寫了幾本數學相關著作，包括〈釋輪〉二篇（嘉慶元年），文中敘述了吉哥布拉耶天文學中關於本輪、次輪的幾何學理論；〈釋橢〉一文則敘述了卡西尼天文學關於橢圓（軌道）運動的幾何學理論。〈釋弧〉敘述了三角法與球面三角形的解法，這三種著作之中，〈釋橢〉是關於《曆象考證後編》中所用的橢圓法的說明，其餘兩種是關於梅文鼎、戴震的數學。其中特別是對戴震〈句股割圓記〉的補充。另外先前提過，關於蔣友仁的《坤輿圖說》，此處再稍加說明。他在乾隆三十二年著作此書時，曾經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何國宗與翰林院檢討錢大昕加以潤色，後刊成《地球圖說》一卷行世，但是因為後來蔣友仁的圖中途遺失，後於嘉慶六年，阮元委託李銳以其解說為基礎，重新進行修復的工作。原二十一圖中，李銳修復了二十圖，尚缺第十圖。次年秋天，焦循由於落第歸鄉，途中拜訪當時浙江巡撫阮元。阮元請他考查李銳修復的圖表，在末尾的說明中，他言道蔣友仁雖說地動太陽靜，但地有靜亦有動，太陽有動亦有靜，二者不悖。說明他對「地動說」^⑨的理解並不充分同時也說明他和梅文鼎一樣，採取融和中西的態度^⑩。他由於研究古算學之故，著有《加減乘除釋》（嘉慶二年）八卷、《天元一釋》（嘉慶四年）兩卷，《開方通釋》（嘉慶六年）最初因為解釋關於《九章算術》等古書中加減乘除法的基本定理，說：「論數之理，取其相通。不遍舉成數，因甲乙而自明。」例如：以甲加乙，或以乙加甲，其和數相等，改作今日一般通行的算式，即 $a+b=b+a$ 等簡單的數學。如此這般，將一般計算定理導入計算法當中，企圖簡化《九章算術》的繁瑣，後兩書係基於元代李治《測圓海鏡》、《益古演談》，秦九韶《數學（書）九章》說明前者乃天元術（含一定未知數的代數），後者係任意開方（任意高次方程式的數值解法），類似這樣的研究，雖然有可能是他出於在私塾中教授子弟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將著重點移到中國固有的算學上頭。

他的數學研究最值得注意的特徵，正如阮元所說：「今里堂說算，不屑舉夫數

⑧ 戴內清：〈近世中國流傳的西洋天文學〉，收錄於《科學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第 32 號（1993 年）。

⑨ 《易餘籥錄》，卷 6，收錄於《木犀軒叢書》。另外〈地球圖說〉收錄於阮亨：《文選樓叢書》（道光二十二年刊），曾經阮元補正。

⑩ 阮元：《里堂學算記》總序評曰：「里堂會通中西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

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說明他對理論或法則性的高度關心，他常說：「得其會通」或「會通其理」這樣的話頭。說明他是基於探討理論的熱忱而寫了上述的那些數學論文。在〈答汪晉蕃書〉中，他說：「算法學習有年，大約皆苦究其難者奧者，近來於至淺至近處求之，頗覺向之至難至奧與至淺至近者原屬一貫。」^①由於古算法基於一貫的定理，如果明白定理的話，一些難題便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他繼續說：「蓋古人算法，往往就一通以求簡便，不知法愈簡便，則愈隱秘而理愈不明。今欲一一明其理，達其用，括九章之條，且核難題之本原，而以一線通之，著為《加減乘除釋》一書。」，文中「就一通以求簡便」的意思是：根據一般定理，進行簡易的解法，其定理的演算，就是一個個的算題。他的信念是：一般的定理，一定在解法之前，正如他在〈加減乘除釋自序〉中明確說明的一樣，「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這裏的「名」是指「少廣」、「勾股」等九章之名；「法」是指解法而言。也就是「少廣、勾股之稱名，係立於解法之後，定理存於解法之前。」之意，他所謂的「得其會通」，也就是解說一般定理的重要性一事。但關於一般定理如何得來，他並沒有具體的說明。恐怕數學之為物，常來自於直覺的靈感，同樣的，對他而言，察覺定理的重要性恐怕也屬於先驗的認識。

此處，再回頭看看他的生活，他自從二十五歲，住在壽氏的鶴立齋以來，一直到四十歲之間，幾乎一直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二十八歲時，當他住在深港卞氏的家中時，於此間完成《群經宮室圖》。次年住在原揚州司馬牛氏處，其人好以詩酒娛賓。進而值得注意的是：次年即坐館於鄭氏家中一事，此一鄭氏係鄭鑑元一族的後人，他原本即與鄭兆玉、兆珩兄弟有所交接^②。鄭氏本為安徽歙縣出身，在揚州成為一成功的鹽商。其後鄭超宗，鄭贊可、鄭士介兄弟在揚州擁有一座廣大的庭園，其中鄭士介的休園特別有名，據云：「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篠園、鄭氏休園為最盛。」^③

就像這樣，焦循一面寄身在揚州大富豪的宅邸庭園中讀書，一面與聚集在此的詩人文友交接，汪晉蕃恐怕也是歙縣汪氏一族，一群人經常在汪中的齋閣中徹夜飲

① 焦循撰：《雕菰集》，卷 14。

② 焦循撰：〈儀徵縣學生鄭君暨節婦吳孺人墓志銘〉，《雕菰集》，卷 22。

③ 李斗撰：《揚州畫舫錄》，卷 8。

酒暢談^⑭。包括了與訪問壽氏的詩人潘掌絲論詩^⑮，在牛氏的宅中認識了畫家周采巖並從其學畫。（〈先府君事略〉）

在他的治學生涯中，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的資助者是阮元。阮元曾說：「余家在北湖九龍岡。族姊夫家焦里堂家在黃珏橋，僅相隔一湖，自幼時便共學，時相往來。」^⑯他們除了是童年的玩伴以外，焦循由於甚得阮元之父阮承信（號湘圃）歡心，常叫他到書房內，督促他寫作。不久甚至娶了他的一個女兒為妻^⑰。雖然他和阮元的關係如是親密，但成人以後，阮元的聲名遠播，焦循依然送自己的著作請他指正，或請他作序。兩人終其一生始終是學問上的良伴。乾隆五十五年，二十八歲的時候，焦循在卞氏的宅邸中完成最早的著作《群經宮室圖》兩卷，便將稿本送給在京師的阮元過目，並請他作序^⑱。阮元被任命為山東學政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從後年（時焦循年三十三歲）開始，阮元經常從任所招其赴幕，其年焦循跟隨阮元到各地辦理科舉事宜，是年冬天，阮元轉任浙江學政，再度邀請其赴杭州就任。在此處得見《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皆為〔元〕李治所著的算書），還是由於阮元的關係，他得以與著名的算學家李銳共同進行古代算學的研究。嘉慶元年，由於阮元的關係，追索萬斯大的遺書。當刊行《經學五書》之際，代阮元為序，序文中說：以經注經，不應等同於傳注的態度^⑲。嘉慶五年，阮元再度前往浙江，這次是以巡撫的身分，同時邀請焦循一起赴任，在此與李銳同居一處，或許是經過阮元的關係才得以目睹金山寺所藏《數學九章》（〔南宋〕秦九韶），兩人一起研究^⑳。同樣是嘉慶七年，由於其母患病之故，決心不再離家遠遊，其間他仍然常到阮元所在的浙江，三十九歲時，終於鄉試合格（四十歲由於會試不第，遂棄舉業）。他雖然不遇，而能專心埋首於數學的研究，沒有阮元的援助恐怕是不能成功的。在阮元的廳榭中，除了幫阮元操刀以外，其餘的時間幾乎都花在研究數學書的研究上頭，事實上，《釋弧》、《釋橢》、《天元一釋》、《開方通釋》等書都是集中在

⑭ 焦循撰：〈亡友汪晉蕃傳〉，《雕菰集》，卷 23。

⑮ 焦循撰：〈黃次和七十壽序〉，《雕菰集》，卷 17。

⑯ 阮元序：《揚州北湖小志》，收錄於《焦氏叢書》。

⑰ 焦循撰：〈阮湘圃先生別傳〉，《雕菰集》，卷 21。

⑱ 阮元：〈焦里堂群經宮室圖序〉，《擘經室一集》，卷 11。

⑲ 焦循撰：〈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雕菰集》，卷 15。

⑳ 《開方通釋》自序，收錄於《木犀軒叢書》。

這個時期完成的。他既可以接受像錢大昕、凌廷堪等人的指導，在交遊的方面，由於與李銳住在一起，鎮日耽於討論，另外又與汪萊有所交接，時人甚至將此二人與焦循並稱「談天三友」^②。

嘉慶四年，當刊行《里堂學算記》（《加減乘除釋》、《天元一釋》、《釋弧》、《釋輪》、《釋橢》）之時，阮元爲此作〈總序〉，特別說明和焦循是自幼年以來的朋友，另外又說自己從年輕時候開始，就對算學特別關心，可惜沒有時間探究其理。而且因爲公務繁忙，遂至偏廢。今見焦循此書之成，既敬且喜。說他超越同鄉的陳厚耀（《春秋長曆》的作者）甚多，爲之稱讚不已。

衆所周知，阮元在嘉慶、道光年間，作爲學術界的領袖，門下人才輩出。另外又刊行編纂許多書籍，對學界貢獻卓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阮元在焦循治學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說明他對焦循有極深刻的理解與多所援助此一事實。

數學研究雖是焦循第一期學術研究的特色，但四十歲時，他面臨人生重大的轉折，其中原因之一當然是他以會元合格的身分高度期待的會試慘遭失敗。另外他的母親的健康情況不佳，身爲長子的他，考慮到母親的情形。嘉慶十年，會試的機會再度來臨，當友人鄭耀庭願意資助旅費，勸他再度進京趕考時，焦循寫了一封長信感謝他的好意，同時也將自己想要孝順母親的心意詳細的傾訴了一遍。這裏介紹其中一部分，他說：

昨舍弟道及足下高誼，怪弟今歲不赴公車，且爲籌行李之資，自任可幫助百金，尤爲感激涕零，容當面謝。但循不北行之故，實有苦心，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送至舟中，舟已過橋甚遠，望見吾母尚立岸側，翹首而望，心甚悽惻。五月歸家，母甚歡。及秋間往浙，與母別。家母則曰：歸家才兩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強健矣。明日上船，家母以鮮鱮魚四尾盛水桶中，令婢攜置船上。家母曰：恐路上澹泊，可烹食之。循時惻然。留二尾在家，帶二尾行。既行，念念在心，遂屢思歸。故冬月歸來，決意家居訓蒙，不復作遠遊計矣。去秋受溼氣，以致尻內脹痛，呻吟痛楚者四十餘日。家母時以爲憂，近雖安好，神色未健，一旦遠行，兩地懸掛，此實弟不出之苦心，非樂安佚而輕仕進也。至外間擬今歲大總裁必是朱石君先生，謂循此去必獲進士，可希鼎甲，不可失此機會。弟既讀書，習舉子業，豈不樂得進士鼎甲哉，竊謂亦有命焉。

^② 阮元撰：〈李銳〉，《疇人傳》，卷50。

乾隆丙午，弟丁外艱，而是年朱石君先生主江南試，一聞試題，弟即作〈過位升堂考〉一篇，已而魁墨出，竟如弟所言，時人頗為弟惜。然循惟悲感而已。庚戌、辛亥，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兩試俱優等，文恪數稱譽於學師，學師遂補舉循為優生，時合郡之人無不以弟必得優貢，或欣慶之，或嫉忌之，紛紛籍籍，乃以他事。文恪與奇大中丞議不合，並此而罷。可見無非有命，命不宜得，即往試誠遇朱公主試，亦必以他故間之。奈何以不可知之事而奔走恐後耶？天稍暖，當入城面候，並祈代致意柿里舍人，不具。嘉慶乙丑正月二十一日。^②

焦循從這個時候開始，不只沒有出去旅行，甚至也不入城市。另外他的治學傾向發生明顯的變化，他開始想要專心從事《易》學研究了。在〈易廣記〉一文中，他說：

余自弱冠學易，至四十歲，二十年間，奔走科場，兼習他學，未曾專心，一無所得。自四十歲至四十七歲專心學《易》，始悟旁通之理，然因名利之心未盡，此際心也不淨，因修郡志故。未得融貫，庚午至今五年，未嘗一日不窮思苦慮，一切功名、仕宦、交遊、慶弔俱不擾吾心，如是每日，遂有進境。〔……〕不得甚苦，得之甚樂。學《易》前後三十年，實僅四、五年，且四十歲前，學六書音韻，學九章天元，諸學既明於胸中，四、五年間且空一切，究其微明。^③

從四十歲到五十三歲之間，他一直專心從事《易》學研究，但正如上文所述，其《易》學係以四十歲以前的天文曆算之學為基礎，而他對《易經》的關心並非肇始伊時，而是自幼秉承父親傳授的家學淵源。其後他一直在思索著〈十翼〉經上下的一貫形態。「循家三世習《易》，循幼秉父教，令從〈十翼〉求經。然弱冠以前，第執趙宋人說，二十歲從事於王弼、韓康伯注。二十五歲後，進而求諸漢魏，研究於鄭、馬、荀、虞諸家者凡十五年，年四十一始盡屏衆說，一空己見。專以〈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脈絡緯度凡五年，三易其稿。四十五歲時，三月八日病寒，十八日昏絕，至二十四日復甦。妻子啼泣，戚友詰問，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眼脹於心。既甦，默思此傳實為贊《易》至精至要之處，二千年說《易》之人置之不論，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以循有志於此經，所以

^② 焦循撰：〈答鄭耀庭書〉，《雕菰集》，卷14。

^③ 收錄於《焦氏叢書》。

昏瞽之中，開牖其心，陰示厥意，於是科弟仕宦之心盡廢。〔……〕甫於參伍錯綜中，引申觸類，悟得《易》之所以為逆數，以往來旁通，成天地之能，定萬物之命。盡改舊稿，著為三書，一曰《通釋》、二曰《圖略》、三曰《章句》。」²⁴

焦循的《易》學，正是先從《易通釋》開始的，他說：「循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²⁵他說學《易》悟得之事有三，曰：「旁通」，曰：「相錯」，曰：「時行」。此三項原則，是根據實測《易經》的經文傳文而得知的，恰好天上錯綜不齊的七政恆星，經由實測，也不出三百六十度的經緯，以書本為依據，進行實際測量的結果，「天」也可以慢慢探知了²⁶。「旁通」何謂也？例如同一個詞語被用在不同的卦時，這兩個卦之間必然有法則上的關聯。例如〈師〉卦 ䷆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以下用「師」字，又如〈同人〉卦 ䷌ 九五的爻辭說：「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也用了「師」字，兩卦呈現陰陽相反的卦象，也就是兩卦有旁通的關係。相錯何謂也，這是根據〈說卦傳〉中所說：「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例如山澤相錯的話，就是把〈艮〉卦 ䷳ 與〈兌〉卦 ䷹ 彼此上下爻相反交錯，例如上山下澤為〈損〉卦 ䷨ ，相反即成〈咸〉卦 ䷞ ，六十四卦皆如此交錯。時行的意思即指當位失道的爻變通趨時，（變通者，趨時者也）以求靈活變通。例如〈乾〉二〈坤〉五掉換的話，接著（〈同人〉、〈比〉→〈家人〉、〈屯〉）或者上與三掉換的話，（〈革〉〈蹇〉）雖然是吉卦，但如果〈家人〉的上爻與〈屯〉的三爻掉換的話，〈革〉的四爻與〈蹇〉的初爻相掉換的話，又從吉卦變成凶卦，如是云云²⁷。

根據這三項原則，《易》的卦序就可以得到統一的說明，這就是焦循的《易》學。雖說他的《易》學主要是繼承漢學的傳統，但並不是死板的繼承，而另外帶有尊重整體的一貫性，並借數學與聲韻學來說明各項問題的特色。因此，他對在此之前的惠棟採取嚴厲批評的態度。他說：「東吳惠氏，雖然近代名儒，其《周易述》

²⁴ 焦循撰：〈告先聖先師文〉，《雕菰集》，卷 24。

²⁵ 焦循撰：〈易通釋自序〉，《雕菰集》，卷 16。

²⁶ 焦循撰：〈易圖序自略〉，《雕菰集》，卷 16。

²⁷ 本田濟：〈惠棟與戴震〉，收錄於《人文研究》第 16 卷第 5 號。當中有關於焦循易學簡要的說明，今多從其說。另外近人程石泉：《雕菰樓易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也是關於焦循易學理論簡要的入門書。

一書，循最不滿，其學大約拘於漢人經說，未能窮聖人之經。」^⑳

《易通釋》二十卷完成在嘉慶十八年，五十一歲時，其間經過三次改訂。初有所得，立刻請王引之指正^㉑。另外又與汪萊討論易學大義，阮元又從其駐地督促他早日完成^㉒。《易通釋》完成以後，接著又著作《易圖略》、進而又寫作《易章句》，由於其為宿疾的腳氣所苦，經過數年，阮元向他索取修改之後的全稿時，他才首度完成《易章句》的全稿。在書信中，阮元評曰：「讀大作《易學大略》，實乃石破天驚之境。」進而在三書合刊《雕菴樓易學》的時候（時嘉慶二十一年，循五十三歲）阮元為其作序，稱讚他說：「深明九數正負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聖人執筆本意，數千年後始得豁然。誠聞所未聞，驚其奇。誠見所未見，服其正。卓然獨闢，確然不可磨滅。」^㉓

焦循在這第二期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是，另外還有《論語通釋》一卷（十五篇）。此書之作係因讀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當中雖然有關於理、道、天命、性、情等名詞的解說，但關於孔子的一貫仁恕的學說，卻沒有得到充分的啟發，而有是作^㉔。

《易學三書》的著作，是焦循的嘔心瀝血之作，雖然這是其弟焦徵的說法，但在此書完成出版後，他又在這數年間，將隨筆記錄、書信等編輯而成《易餘籥錄》三十卷，另外將《三書》以外門生故舊關於《易》學的問答集合而成《易話》二卷。進而從癸酉（五十一歲）年開始到五十六歲之間，將隨手記錄的資料搜集而成《注易日記》三種，另又著《易廣記》三卷。同時又完成收錄在《皇清經解》中的《周易王氏補注》以下的六種著作《六經補疏》，係在《易學三種》完成以後，以《禮記補疏》為首，依序為《論語補疏》、《左氏補疏》、《尚書補疏》、《周易補疏》、《毛詩補疏》。

^⑳ 〈與王引之論易〉，收錄於羅振玉輯：《昭代經師手簡》。

^㉑ 〈易通釋序目〉，另外，王伯申先生手札一篇見附於焦循：《雕菴樓易學》卷首。

^㉒ 焦循：《雕菴樓易學》序。

^㉓ 同前註。

^㉔ 《論語通釋》初稿完成於嘉慶八年（四十一歲）八、九月間。今收錄於《木犀軒叢書》者有十五篇。翌年九月，削去〈異端〉、〈多〉、〈據〉三篇，乃成十二篇。但僅有十二卷本之自序收錄於《雕菴集》當中，似未傳世。另外請參照胡適：〈焦循的論語通釋〉，收錄於《胡適文存》，第3集，卷7。

但自《易學三種》之後，他最貫注心力的著作，也就是直至今日，吾人仍深蒙其惠的名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焦循在《孟子正義》的末尾的〈孟子篇序〉記述他從弱冠開始，即好讀《孟子》，便有志作《正義》。他的友人黃承吉作〈孟子正義序〉，其中仔細說明了編纂《孟子正義》的過程。根據此文³³，該書的動機原是某日與焦循聚在一起，有鑑於各經的《正義》僅守一家之注，未能兼綜博采。因而考慮各註一經兼收百家，以成一完善之注本，冀能超越唐代的《正義》。兩人相約，由黃氏注《周官》，焦循分擔《易經》與《孟子》。焦循於五十五歲（嘉慶二十二年）的冬天開始著手。當然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工作，而是由其子廷琥的協助開始的，首先著手長編的編纂，廷琥說：「採錄本朝通人之書，令不肖查寫，或專說《孟子》，或雜見他書，一一纂出，依次編成《孟子長編》十四帙。」

以下以廷琥的回憶為基礎，讓我們看看他們編纂《孟子正義》的經過吧。其言曰：

戊寅十二月初七日，開筆撰《正義》，自恐懈弛，立簿逐日稽省，仍如前此注《易》簡擇長編之可採者與否者。有不達則思，每夜三鼓後，不寐，擁被尋思某處當檢某書、某處當考某書，天將明，少睡片刻。日上紙窗，府君起盥漱，即依夜來所尋思一一檢而考之，語不孝曰：「著書各有體，非一例也。有全以己見貫串取精，前人所已言，不復言，余撰《易學三書》及《六經補疏》是也。有全錄人所已言，而不參以己見，余輯《書義叢鈔》是也。有採擇前人所已言，而以己意裁成損益於其間，余所撰《孟子正義》是也。各有所宜，亦各有所難。」是年又四月，撰至〈萬章下〉，府君曰：「此書初稿看來七月可完，必加以討論修飾，惟神氣日衰一日，殊自畏也。然惟初稿最難，今已成十九卷有奇，未成僅十卷耳，用當努力為之，不以衰退為山九仞，功虧一篑，宜自勉夫。」嗚呼！痛哉！府君之心血，竟以著書耗矣。一年前已知神氣之衰，不孝不能婉轉請少緩一日之功，今年病作，即患舌燥無津，又不能力求治法，痛哉！痛哉！已卯七月十四日，《孟子正義》草稿成，次為三十卷，於是討論群書。至庚辰正月，修改既定，乃手寫清稿三卷就正於舅父阮芸臺先生。四月，令不孝校對一過，又重自手錄。至七月，共手錄十二卷，而病作，病中猶

³³ 黃承吉：〈孟子正義序〉，收錄於《夢陔堂文集》，卷5，另外收錄於《焦氏叢書》者則無刊刻年月。

以未能錄完為憾語。不孝曰：「《孟子正義》無甚更改，惟所引書籍仍宜逐一校對，恐傳寫有誤耳。」府君自癸亥家居至庚辰，十八年中，著書將三百卷，成不朽之業，而心血實耗於此矣。痛哉！痛哉！^{③④}

然而其子廷琥無暇哀悼父親的死亡，馬上又接著進行《孟子正義》的校對與謄稿的工作，但他在父親逝世不到一年內，便因吐血病倒，醫生勸他服用人參、鹿茸，然因價錢太貴，只能望而興嘆。其父親的友人汪掌廷致書給他，告訴他需要保重身體，才能完成父親的學問，不要吝惜金錢。於是廷琥耗費財產，以千金購買鹿茸、人參等藥材，治療了一個多月左右，才恢復健康。臥病中，其父原稿不離其身，當其痊癒之時，馬上又投入校閱的工作，緣此，又再度病倒。此度藥石罔效，終於道光元年二月去世。距離其父去世僅半年有餘，臨終前數日，他帶著父親的書信拜訪其叔焦徵，請求他的援助。說道：「吾死不足惜，然父之書未刊，母老子幼，至為遺憾。吾父著作未刻行者甚多，《孟子正義》投注心血甚多，叔父，能否助我一臂之力。至少出錢，請先出版，若不如是，則我死不瞑目。」

《孟子正義》的校對與謄稿，就這樣由焦循之弟焦徵所繼承。似乎是在道光元年二年之際付梓的，今日一般常見的《孟子正義》並沒有序文，只是在篇序的末尾，記錄了編纂的動機與經過。《焦氏叢書》收錄有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以及所附的黃承吉序文。阮元的傳係作於焦循歿後不久，而黃承吉的序文則是在焦廷琥死後，基於其叔父焦徵的請求所作。

就像這樣，《孟子正義》三十卷成於焦循、焦徵、焦廷琥父、叔、子三人之手，其中特別是，焦循與焦廷琥父子為此而喪命^{③⑤}。

二

其次讓我們看看關於焦循的治學態度與方法。他最早的著作是《群經宮室圖》（乾隆五十五年，二十八歲）兩卷，此書雖然關於群經，特別是三禮中所見到的宮

^{③④}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叢書集成三編》據清光緒二年（1876）衡陽魏氏重刊焦氏叢書本影印（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頁32上—33上。

^{③⑤} 類似焦循編纂《孟子正義》的例子，還有稍後的劉文淇欲注《左傳》，至歿未能完成定本，後由其子毓崧克紹箕裘，進而由其孫壽曾紹其業，也始終未能完成。（《清史稿·儒林傳三》）另外一個知名的例子是由劉寶楠、恭冕持續完成的《論語正義》（見《論語正義》後敘）。

室制度的考證，阮元在序文中說：「其書往往異於先儒，學侶或致疑。」³⁶實際上，焦循在此書盡是指摘鄭玄的錯誤。在〈復江良庭（江聲）處士書〉中，對江聲進行反駁。其言曰：

循易鄭氏處，先生辨之，不敢多辨。惟以先生遵鄭之故，轉至違鄭，是則急急欲與先生共議者矣，循學無師傳，竊謂西京拘守之法，至鄭氏而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精核，果有以補其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書自在，非易者所能蔽，《詩箋》多異《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氏說經之法，正如是也。³⁷

一個二十八歲，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竟敢向長自己四十二歲，而且是曾寫過《尚書集注音疏》大著的老前輩，這樣大膽的表示自己的看法。焦循對漢儒的經說特別是被當作權威的鄭玄，採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批判態度，這種立場與惠棟的固守漢代的作法全不相容。另外他在《里堂家訓》下之中如是言曰：

近世學者無由另立考據之名，後其為此奔走，然所據者漢儒而已，而漢儒之中，所據者鄭玄、許慎而已，執一害道，莫此為甚。專執二人以廢眾家，或自命許慎、鄭玄，或以此標置，自矜為考據學，余深惡之。³⁸

堅守一家之言，排斥他說，而且視漢儒的說法為絕對無上真理，此文正是在嚴厲批評當時的考據學風。但相對於袁枚對考據充滿輕視的言論，他也毫不客氣的指出他的錯誤。其事與孫星衍致袁枚的書信有關，在書信中，袁枚說：「形而上謂道，著作是也；形下謂之器，考據是也」。由於孫星衍對考據深造有得，袁枚恐其傷害其詩文才華性靈，故而去信孫星衍忠告他莫以學害詩。孫星衍立刻去信反駁，曰古人道器未分，考據、著作也不分。考據與著作必然合為一體³⁹。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乾隆六十年）顯然是因為受到兩人刺激而發，他一方面贊成孫星衍的說法，一方面又覺得不夠充分。認為經學若無性靈，則徒然只是補苴掇拾而已，他並不特別用考據一詞，而是經學一詞已包含考據之義在焉。他說：「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為之

³⁶ 阮元：《擘經室一集》，卷 11。

³⁷ 焦循撰：《雕菴集》，卷 14。

³⁸ 收錄於焦循：《傳硯齋叢書》。

³⁹ 〈答袁簡齋前輩書〉，收錄於孫星衍撰：《問字堂集》。另外請參看本田濟：〈袁隨園的哲學〉，收錄於《鈴木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

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旨，以正立身經世之法。」^{④①}經學係以諸子、詞章、方技等為根柢。這種治學態度，需要「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的態度。袁枚的性靈說顯然只指詞章一事，相對於此，焦循駁斥道：「有性靈之詞章，必由經學，而徒取詞章者不足語此。」詞章必以經學為根柢，真正治經學的話，則必生真性靈，比焦循稍早的前輩章學誠也說：「考據未可稱家，學問之考據，如詩文之有事實。〔……〕以人身喻之，學問如神智，文詞如肌膚，考據如骸骨，三者備而後可稱著述。著述隨學問各自名家，別無考據或著作家。」^{④②}章學誠與焦循的說法雖然有所出入，但旨趣大抵相同，同樣是說治學一事性情與功力同樣是不可或缺的。今人只能以心得與專精來迫近古人的成就^{④③}。焦循恐怕曾經看過章學誠的文章吧，在〈讀書三十二贊〉中他特別舉出《文史通義》，稱讚章學誠：「紀事之學，莫如章侯，述而不造，功在咨諏。陶鑄群言，點竄塗句，辭恐已出。不違如愚，描摹關鍵，學究文儒，卓哉班馬，孰矣韓歐，學者師此，庶端厥趨。」^{④④}焦循可以說是當時章學誠史學少數的理解者之一，就此思之，章學誠的學問論，影響及於焦循亦為理所當然。在〈與劉端臨教諭書〉一文中，他主張學問應該以「思」（思考）作為基礎，曰：「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④⑤}其旨正與章學誠所著〈原學〉三篇所主張者相同。

如果竭盡自己的思考，是治學要諦的話，當然必須撤去漢學、宋學的門戶之見，焦循所尊敬的前輩戴震，經常批評宋學，對此，焦循說：「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一書，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為孔子之義理也。」^{④⑤}

^{④①} 焦循撰：〈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雕菰集》，卷13。

^{④②} 〈詩話〉，《文史通義·內篇》五。

^{④③} 〈博約〉中、下，《文史通義·內篇》二。另外參照島田虔次：〈章學誠的位置〉，收錄於《東方學報》（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41冊（1970年）。

^{④④} 焦循撰：《雕菰集》，卷6。

^{④⑤} 焦循撰：《雕菰集》，卷13。

^{④⑥} 焦循撰：〈寄朱休承學士書〉，《雕菰集》，卷13。

焦循雖然尊敬戴震，衆所周知，《論語通釋》也是追隨《孟子字義疏證》的辦法，將《論語》當中的重要概念歸納定義，以求得真正的意義^{④⑥}。但是正如上文所說，他對戴震批評宋學的態度不滿，更具體地說：這種不滿在於戴震在歷史的根源中，不問義理，一味拘泥於漢學、宋學的門戶。

因此焦循自身的治學立場為何？一言以蔽之，即指「一貫」或「貫通」。這種「一貫」的態度在他所有的著述中具體展現，另外在文集及著作中到處強調，這裏主要以《論語通釋》為基礎，檢視他對異端的看法。其言曰：

聖人之道大矣，其言可曰一以貫之，焉只止於學無常師。聖人學無常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孟子·盡心》），故其道小。（〈釋異端〉）

這裏，他對「異端」的解釋是「執於一端」（執兩端者為聖人），遭到焦循的排斥。說明治學或治德之道，在於不斷擴大。他對不同學問立場抱持著寬容的態度，常警告自己不要抱持門戶之見。他以為孔子的「一貫」，即曾子所說的「忠恕」之道。故其曰：「成己及物」或曰：「由一己之性情推極萬物之性情，各各用極，此即一貫之道。」^{④⑦}（〈釋仁〉），這裏應該注意的是：他不是要放棄自我，而是從自我出發，推及萬物。這與先前所說的尊重性靈一事有關，另外關於性善的解釋，他對食、色等人世的慾望加以肯定^{④⑧}。

從自身出發，而推及他人之際，如何面對彼此之間本性與能力之間的差異，他說：「人各一性，未可強人以同己，亦未可強己以同人，有同有不同，雖同實異。」（〈釋異端〉），另外又說：「一人有一人之能，未可以己之能驕人所不能。」^{④⑨}以忠恕的精神對待他人是他的基本態度，故其言曰：「天下之學，皆從己之學，立達天下，皆施出己。忠恕之道至此始盡，聖人之仁至此始大，一貫之旨，至此始合通內外。」（〈釋仁〉）

如此一來，尊重每一個人的個性，當然就不應隨意詆毀他人，更當力戒妄自尊大，他常常強調批評與論爭對學問的進步是絕對必要的，但這樣的論爭不應以自己

^{④⑥} 另外，在焦循撰：〈讀書三十六贊〉，《雕菰集》，卷6，舉《孟子字義疏證》，稱之曰：「性道之譚，如風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諸掌。」，又〈申戴〉，《雕菰集》，卷7，指出戴震的學術自有獨特的義理。

^{④⑦} 焦循撰：〈一以貫之解〉，《雕菰集》，卷9。

^{④⑧} 焦循撰：〈性善解〉，《雕菰集》，卷9。

^{④⑨} 焦循撰：《里堂家訓》，收錄於《傳硯齋叢書》。

的意見來與古人爭勝，而應該是：

（於前人之說），力學之久，積疑成斷，了然有得於心。以補正前人之缺與誤，此學經者所不可廢也。^{⑤①}

當論爭批判時，絕不應將自己的見解視為「定論」。這樣一來，又變成孟子所說的「執一」了，他又言曰：「顧亭林語潘稼堂曰，人最忌以未定之書示人，此言是也，而不然也。自以為定，誠定乎？人以為未定，誠未定乎？夫以為定，亦自以為定耳，而人之視人之書也，恆以為不足定。定不定果何事乎？少時之作，壯而視之，或以為未定。壯時之作，老而視之，或以為未定。然究之，少壯之作，不必誠不定，老年之見，不必其遂定。〔……〕夫天下之言，未有能定者也。」^{⑤②}

此處他強調所有學問的見解都有相對存在的價值，一定要接受批判與否定，才會進步。剛才已經說過他認為對他人必須採取忠恕的態度，同樣的，他對自己的學術，也抱持著嚴格的態度。在一封給友人的書信中，提到〈釋臈〉這一篇數學論文，他這樣說道：

讀吾兄兩手札，鄙作所收〈釋臈〉，蒙細閱簽出諸條，足正弟誤，已改定之。常思朋友之益，非在揄揚，而在勘核，揄揚計一時名，勘核計千百年名，然必好學深思，必心知其意，以肫誠去浮游氣，故與以忌妒伺隙者不同，始中曲中。如吾兄者，真吾益友。^{⑤③}

像這樣，他對自己的學問嚴格的要求，絕不能等閒視之，同時他也強調應該虛心的接受他人的看法，這與他所強調的忠恕態度正是一以貫之的。上文所述，正是由於他自己不斷追求學問進步的熱情所致。他認為學者之為物，絕不能數十年如一年而不改，他如是訓誡子弟。其言曰：

聖賢學問，以日新為要，三年前聞人談如是，三年後聞人談亦如是，其人可知也，越五年十年其學如故，係據書冊口耳剽竊，原非自己心得，豈足與議。^{⑤④}

從這段話可以大略看出他那每天不斷追求學問進步的方式。每日求新求進步仍然不夠，還須有深造有得。因此就必須有時保持頭腦的靈活。

^{⑤①} 焦循撰：〈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雕菰集》，卷 15。

^{⑤②} 焦循撰：〈說定上〉，《雕菰集》，卷 10。

^{⑤③}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所引答沈萬鍾書。

^{⑤④} 焦循撰：《里堂家訓》下。

焦循的學問論，雖然在當時不能說是最為突出的，但這些意見，正是他以生命實踐時經過親身體驗後，所流露的切身之感，不免使我們深有同感。正如前面說過的，只要我們一想到他編纂《孟子正義》的經過，就是最真實的寫照。

結 語

以上所說，只是焦循學問的一小部分。他的治學方式富有自由寬容的精神，而且以極嚴格的態度崇尚獨創、心得、確實性，進而希望達到學問不斷進步的境界。他的治學態度不禁讓我們聯想到今天所謂的「科學精神」。事實上，從他周圍的學問環境來看，正是以揚州為中心，得以廣泛自由地討論學問的場合。原因之一在於揚州聚集了一些家財萬貫的鹽商，他們有廣大的園邸，於此處招集文人學者舉辦詩文集會，或者提供他們住處，讓他們專心讀書，由於鹽商在經濟上的支持，於是學問活動也積極地進行。鹽商當中，自己收集古書、古器物、書畫設計藏書樓，或出版善本書也大有人在。例如鹽商徐氏處有程瑤田、齊召南等人聚集^{⑤④}。鹽商的馬曰琯、馬曰璐兄弟收集十萬卷書，乃至築一藏書樓以收藏這些書籍。其書籍號稱甲於大江南北^{⑤⑤}，鹽商程晉芳自己也喜歡讀書，收集了五萬卷的書籍，招集四方名流，與袁枚、張翼、蔣士銓等人以詩歌唱和^{⑤⑥}。關於鹽商的經濟力與對揚州學術文化的貢獻，在佐伯富博士的名著《鹽與中國社會》^{⑤⑦}中有詳細的說明。焦循也是其中的一員，如前所述，他也接受鹽商的襄助，與當地的學者文人往來，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學問體系。事實上，當地聚集了許多著名的學者，許多後世成名的文人也經常過訪或棲息當地，故而揚州在乾隆、嘉慶年間號稱風雅淵藪。焦循在年輕的時候，經常在汪中的齋閣當中，與友人徹夜長談，這件事或許可以說明當焦循以數學家成名以後，在客居當地的王萊之處與其間有人往來的事實。可以說他的學問是透過與師友之間自由活潑的討論風氣而出現的產物。他說忠恕之道。主張去執一，廢定論，若考慮這種自由活潑的空氣，也就不難想像了。他的主張不僅超越當時漢學家的學

^{⑤④} 李斗撰：《揚州畫舫錄》，卷 14。

^{⑤⑤} 《清史列傳》，卷 71，〈馬曰琯〉、〈朱彝尊〉。

^{⑤⑥} 劉壽增撰：〈程晉芳〉，《光緒江都縣續志》，列傳第四。

^{⑤⑦} 收錄於佐伯富：《中國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會）第 1 冊（1969 年）。

問方法，在反對株守一端，而強調變化與進步的觀念時，又著〈說權〉^{⑤⑧}八篇一事，似乎正宣示著他與下一個時代的公羊學者的思想聲氣相通吧。

附 記

本文為昭和四十七年文部省科學研究費一般研究D〈清朝考證學與西學之關係〉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另外，本稿要旨曾在昭和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懷德堂春季講座中發表。

——譯自《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4期（1973年12月），頁30-57。

^{⑤⑧} 焦循撰：《雕菰集》，卷10。